

近世日本与西班牙的贸易

李德霞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摘要] 近世以后继葡萄牙人之后到日本经商的欧洲人是西班牙人。然而,日西贸易仅在短时间内有过繁荣,而大部分时候是凋萎的。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既有日、西两国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又有其他在日经商的欧洲国家的竞争与破坏。

[关键词] 近世;日西贸易;时断时续;原因

[中图分类号] K3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93(2008)03-0044-05

[收稿日期] 2008-06-19

[作者简介] 李德霞(1972-),女,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近世以后,紧随葡萄牙人之后挺进日本的欧洲商人是西班牙人。天正十二年(1584年),西班牙商船驶抵平户,加入了对日贸易的行列^{[1]117}。起初的贸易多集中在平户和长崎,西班牙人曾有一段时间在长崎拥有一个繁荣的基地,大多数南部大名都对他们很友好,九州一定数量的基督教人口的存在加强了他们在那的据点。“当与日本的贸易繁荣兴旺时,马尼拉是东方的奇迹和珍珠。”一个叫代尔加多(Padre Delgado)的西方人如此感慨道。然而,和日本的贸易联系仅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且整个过程起伏不定^{[2]99}。西船赴日贸易的航期几乎毫无规律可言,一年可能只有1~4艘私家船去冒险,但在一些独立的船主、九州部分有事业心的大名或幕府将军本身的主动邀请下,这种贸易时常间歇性地恢复。偶尔,当马尼拉的军火库和公共仓库需要一些材料与供给时,马尼拉总督也会派艘船到日本去进行必要的采购^{[2]114,119[3]3}。

—

西日贸易之所以出现这种时断时续、忽冷忽热的局面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日本虽然盛产白银,但西班牙人不在乎日本的白银,他们

自己在墨西哥和秘鲁就已有挖不竭的银矿^{[3]3}。因此,西班牙人当然不像葡萄牙人那么热衷于对日贸易,马尼拉大帆船只是偶尔与日本发生直接关系,在它们几十年的航行中,它们基本上是在远离日本视线之外的航线上行驶,只有当天气恶劣无法继续前进时,他们才主动驶向日本沿海,希望找到能供它们暂时停靠修整的避难港。德川家康提出的让大帆船到日本贸易的邀请从未被西班牙当局认真思考过。他们所考虑的是,在必要时大帆船能免受骚扰地自由进入日本某个港口,直到继续其航行为止^{[2]120-121}。

第二,西班牙与日本的关系很早就因政治和宗教上的互不信任而复杂化了^{[3]3}。1590年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他于1591~1593年间多次致书马尼拉总督,逼迫他顺服与入贡,并威胁要吞并菲律宾^{[4]Vol.15,67}，“偃降幡而来服,若匍匐膝行於迟延者,速可加征伐者必矣,勿悔。”^{[5]91}但秀吉的狂妄之语除了让对方提高警惕外,什么目的也没达到,因为他那时根本不具备远征的能力,这件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庆长元年(1596年),一艘从马尼拉起航的西班牙“圣·菲利普(San Felipe)”号大

帆船因风暴被迫在土佐的浦户抛锚^[6],当时正陷入巨大的财政困境中的秀吉在一些反基督教顾问的怂恿下,海盗式地掠夺了船上价值 150 万的货物^{[2]122 [3]59}。面对日本官员的审讯,“圣·菲利普”号上直率的西班牙舵手为了让日本人对其王室主人的力量留下深刻的印象,拿出了一张画有西班牙帝国的领土的地图。当被问及西班牙国王是如何统治世界上这么多的地方时,舵手骄傲地回答道:“这再简单不过了,我们的国王通过向他想征服的国家派出修道士,由这些修道士负责使其国人皈依我们的宗教。在修道士们取得相当进展时,再派军队进去,新基督徒加入,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搞定其他人。这件事让秀吉获悉后,大发雷霆,“什么!他咆哮道,“我的国家中到处是叛徒,而且人数与日俱增。他发誓要把基督徒从日本清除出去^{[2]102}。1597年2月,6名方济各会修道士、3名耶稣会士和17名日本新入教者在长崎殉教,这就是有名的“26圣人事件”^{[2]102-103 [4]Vol 15, 17}。结果,丰臣政权终止了与西班牙的国交。他甚至批准一个叫奎埃姆(Faranda Quiemm)的部下准备发动对菲律宾的远征,只是由于缺乏资源和积极性而不得不放弃。

继任的德川家康曾有过用西班牙人取代葡萄牙人的想法,他一改丰臣秀吉的恐吓政策,向西班牙反复表达了与马尼拉乃至墨西哥建立友好通商关系的愿望^{[3]72}。在方济各会传教士的斡旋下,1598年,日西复交^{[5]104}。当马尼拉总督特洛(Tellob)在家康掌权后不久,向他抗议日本海盗船对菲律宾的袭击行为时,家康马上下令抓住在日本南部港口结关,准备到菲律宾水域劫掠的六艘船,并将船上的200~400名船员钉死在十字架上,以此作为阻止这些海盗航行重复进行的紧急警告。1602年,当因风暴而被迫躲进平户港的“圣埃斯皮里图(Espiritu Santo)号大帆船面临着与“圣·菲利普”号相同的命运时,德川家康表现出了与丰臣秀吉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不仅答应赔偿西班牙人被平户人夺走的东西、惩罚肇事者,还向西班牙人出具了防止类似暴行再次发生的书面保证^{[2]118-124}。为了鼓励西班牙人来日通商,德川家康赐给他们朱印状的同时,还授予他们比葡萄牙

人更优越的条件,如西班牙人可不受丝割符制度的制约,他甚至同意让方济各会在江户建一教堂传教^{[5]105}。

尽管德川家康一心想利用西班牙人来打击葡萄牙人的垄断地位,马尼拉的西班牙当局也因惧怕日本的实力而希望加强与日本的友谊,但西日关系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这大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反映:首先,家康曾打算把西班牙的贸易从九州转移到自己的根据地——关东,以赚取更直接的利润,施行更密切的控制。为此,他邀请西班牙商船到坐落在浦贺的江户湾来做生意。1603年,阿库纳(Acuna)总督应邀派“圣地亚哥(Santiago)号到浦贺去,但由于天气恶劣,船转往平户。初次尝试的失败未能阻止马尼拉总督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相当有规律地派船到江户湾去,因为他深知此举的政治意义。然而,对于此项深受家康重视的贸易事业,西班牙舵手与商人却因航行过程中增加的风险而不太热衷。西班牙兴趣的任何松懈都将从根本上把缺乏耐心的幕府将军推向新近到达的荷兰人和英国人,这是显而易见的^{[2]120}。

其次,德川家康一直梦想着能实现与西属美洲的商业往来,但西班牙始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将对自己的太平洋计划构成威胁。1602年,家康派了一位被西班牙人称为奇基诺(Chiquino)的使者到马尼拉去商谈在新西班牙开展贸易之事,阿库纳总督认为直接拒绝日本的要求对政治上不利,于是他热情地接待了来使,用大量的礼物和含糊的承诺把他打发走了。这事就这么搁置着,直到1609年,马尼拉前总督维韦罗(Rodrigo de Viveiro)遇船难滞留日本时,家康趁机逼迫他满足自己多年来到美洲贸易的夙愿,后者亦提出三大条件:保护天主教;确认两国之间的“联盟”;驱逐荷兰人。家康同意前两条,拒绝了第三条,同时还要求西班牙派矿工和造船技师来指导日本人。双方于1610年7月缔结了一份体现两国意愿的协议,家康还派了23名日本人随同维韦罗到墨西哥去交涉通商。庆长十八年(1613年),仙台大名伊达政宗亦遣家臣支仓常长

阿库纳总督答应将此事呈报西班牙解决,但在没完没了的官方审查过程中,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到墨西哥乃至欧洲去寻求商机^{[1]140-141 [2]125, 109-110}。

1616年,伊达政宗再次派船到阿卡普尔科,但被明确告知下不为例^{[2]128}。因此,日本到美洲贸易的想法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德川家康倍感失望。加之新教国的添油加醋和传教士的过度热情,均使西日两国的关系迅速恶化了。

再次,与传教运动息息相关,并给商业联系投上阴影的是外交关系进程。日本人敏感的种族自豪感与西班牙人特有的傲慢感是相匹配的,这两个具有如此易燃民族特征的国家接触,注定了其关系是极其脆弱且长期不稳定的。西班牙人由于担心与其强大而不安定的北方邻居的军事纠纷而不断处于焦虑之中,日本人则常常把马尼拉的任何不寻常的力量增长或军事准备都看做是计划毁灭他们。于是,双方始终被一种怀疑的气氛笼罩着,而偶尔不愉快的事件与令人烦恼的宗教问题又大大加强了这种气氛,只能通过彼此经常性的互派使者来暂时缓解。然而,日本政府对马尼拉狂热传教者的忍耐毕竟是有限的。1616年家康去世后,日本更加排斥西班牙。修道士祖尼加(Padre Zuniga)于1618年和1620年的两次访问不但全然无效,反而以自身的殉教为终。1622年,一个从马尼拉来的使团未得到接见就被迫撤出日本。两年后,菲岛总督派来的另一个使团越发不受欢迎。大概在1625年日本港口再次对马尼拉的西班牙船关上了门,有四艘后来在长崎港出现的船只被打发走了。那个城市的领主对一位西班牙船长恐吓道:将来若有任何西班牙人胆敢进入这个港口,那么他的船与船员都将被烧掉^{[2]111, 120}。1628年,日本与马尼拉的关系又变得十分尖锐。5月,应葡萄牙人之请求奔赴澳门去提供援助的西班牙舰队,因发现葡萄牙人已自行击退荷兰人,便转往暹罗湾去为1624年席尔瓦(Don Ferando de Silva)之死及其船之丧失报仇。指挥官阿尔卡拉索(Don Juan de Alcaraso)抓获并截劫了几艘暹罗船之后,又想起日本人当年在席尔瓦的被打败和死亡中所扮演的角色,于是他鲁莽地烧毁了当时在暹罗湾的一艘日本朱印船,杀

死了许多船员,还没收了幕府的旗帜与贸易通行证,最后把42名日本俘虏押回马尼拉^{[3]115, 111-112}。有关这一暴行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幕府将军勃然大怒,立即对停泊在长崎的三艘葡萄牙平底小船实行禁运,通知他们如若西班牙不予马上赔偿,则其生命和货物都将丧失。日本人早已知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是同一国王的臣民,因此要求他们共同负责。经过徒劳无获的申辩后,澳门市议院只好请求马尼拉总督服从日本的要求,而马尼拉亦担心荷兰—日本的联合进攻,故在1628年7月召开的政务会上承认对日本朱印船的捕获是非法的,决定将42名日本俘虏送回日本^{[2]112 [3]116 [7]104}。1630年到马尼拉的两任日本大使在得到西班牙人热情接待的同时,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两位使者于1631年带着西班牙希望恢复对日贸易的提议返回长崎^{[3]124-125 [7]104-105},贸易在日本南部地区重新打开。到1632年,一切似乎又处于较好的解决过程中^{[2]112}。然而,菲律宾总督、总船长与部分日本领主们重建友谊的努力证明是白费心思,长期积累下来的相互猜忌加上西班牙修道士们难以控制的传教热情已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安排。1633年,萨拉曼卡(Salamanca)总督谴责了传教士公然反抗日本和西班牙政府的法令坚持去日本的行为。一年后他又说,日本贸易因传教士的缘故对菲律宾关上了大门。1636年,科库埃拉(Corcuera)总督亦宣布:“与日本的贸易已被几个不谨慎的修道士破坏了。”^{[2]113, 101 [4]Vol 25, 44}西班牙和日本关系中的这种不安定的因素使得贸易的继续展开与外交的友好往来已不可能了。直到1637年,德川家光还计划远征菲律宾,只是由于这一年爆发岛原起义而未能付诸实施^{[3]158}。但1638年的一份法令严厉禁止西班牙人以任何借口踏上日本国土或进入日本港口,违者格杀勿论^{[2]120}。

第三,虽说在西、葡合并之前,驻扎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因不了解东亚形势而不自量力地企图征服日本,如拉维萨里斯总督于1574年,马尔纳多纳多舰长于1575年先后写给西班牙国王腓

事实上,马尼拉西班牙当局曾数次阻止传教士到日本传教,但仍有不少传教士冒死偷渡日本,从1618年6月到宽永年间,共发生了十几次偷渡事件,如1629年有3人偷渡,2人成功,1630年1人,1632年1人,岛原起义爆发的1637年有5人,直至锁国后的1642年还有5人。参阅《德川时代史论》,第113页。

力二世的信中均提到入侵日本的想法,因为“这将对陛下的事业产生重要的影响。”^{[4]Vo1 3,302}然自1580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王室联合后,马德里政府基本同意了葡萄牙的请求,把日本贸易领域的实际垄断权让给了他的葡萄牙子民^{[2]119}。因此,与其说是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倒不如说是日本政府更热衷于促成日、西的直接通商。自1591年起就屡次威吓入侵吕宋的丰臣秀吉曾于1593年接见过由菲律宾总督马里纳斯(Don Gomez Peio de Marinas)派来的四名方济各会修道士,还默许他们在京都、大坂和长崎等地创建传教机构,目的在于希望他们能吸引马尼拉的商人来日经商,以打破事实上由澳门商人所享有的对日本外贸的垄断^{[3]58}。至于十分注重海外贸易的德川家康就更不用说了,他曾对西班牙商人寄予很大的厚望,这点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

简言之,西班牙对日本白银的不在乎,西日两国长期的互不信任,以及西班牙对日贸易的不热衷,均是造成西日贸易无法长期稳定进行的因素。

二

除了西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矛盾之外,其他在日欧洲人的竞争与破坏,也是造成西日贸易忽冷忽热的重要原因。

尽管葡萄牙与西班牙是名义上的政治同盟,西班牙也注定不是葡萄牙人危险的竞争对手,但澳门商人却极其憎恨西班牙人进入日本市场,因为他们把它视为自己独占的政治、宗教和商业领域^{[7]45},决不允许他人染指。他们很担心西班牙人的竞争,总是尽其所能地阻拦菲律宾的西班牙人直接闯入那个市场。他们得到了耶稣会士的支持,后者不希望自己的传教地盘受到马尼拉来的方济各会教士及其他教派修道士的侵犯^{[2]119}。西班牙人经常向王室抱怨葡萄牙人的不友好态度,“圣·菲利普”号事件发生后,很多西班牙幸存者认为秀吉是在持敌对态度的耶稣会士和澳门商人的挑拨下才作出如此不利于西班牙人的决定,他们甚至断言葡萄牙人一再提醒秀吉要注意西班牙扩张主义的倾向,抵赖和隐瞒了腓力二世是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合法统治者这一事实^{[3]59}。在1606~1607年的不同时候召开的印度委员会上,几次讨论了是否允许修道士通过菲律宾到日本布道及是否允许马尼拉与日本通商等问题,但葡萄牙委

员每次都坚决反对^{[4]Vo1 14,109}。1609年,家康趁菲律宾前总督维韦罗遇船难困于日本之际,与他就扩大菲日现有贸易的方法、方式展开谈判,双方还签订了条约。这事让葡印当局颇为担忧,因为它威胁到切断澳门——长崎贸易^{[3]72}。

面对葡萄牙人的竞争,西班牙人有时也予以反击,如菲律宾的西班牙托钵僧教团曾多次批评了葡萄牙耶稣会士参与丝绸贸易的行为,在他们的反复抗议下,1608年,马德里王室发布的一份法令明确禁止任何宗教团体在日本从事“任何形式的贸易或商业”活动,虽未提及教团的名字,但毫无疑问,这份法令针对的就是葡萄牙的耶稣会士^{[3]71 [5]104}。在1609年的“迪乌斯”号事件中,造成葡萄牙人于这一年的夏秋两季在日本声誉很不好不但有日本幸存者的控诉和荷兰殖民者的离间,更有西班牙人的阴谋诡计^{[3]76-77}。据说当时在日本的菲律宾前总督维韦罗曾告诉过日本人,西班牙人愿意且能够取代葡萄牙人成为中国丝货的供应商,他还允诺每年不只派1艘而是2~3艘丝船。不管维韦罗是否说过这番话,但最后的结果是,德川家康经过初步的犹豫后,命令有马与长谷川拘捕“迪乌斯”号上的主船长佩苏亚(Andre Pessoa),不论是死是活^{[7]58}。

西班牙人的不热心、日西长期相互防备的心理、西班牙修道士的狂热、葡萄牙人的破坏等等因素注定了西班牙人很快就得撤出日本。葡萄牙人在庆幸之余,却没料到他们从此要为西日间的任何纠纷或马尼拉西班牙人的一切违反日本法的行为负责。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前已述及的1628年西班牙军舰在暹罗截击朱印船后,幕府为报复,扣押了长崎的葡萄牙船,并中断了日葡贸易,直至1630年才恢复正常^{[5]113-114}。1638年驶至澳门的葡萄牙平底小船带来了长崎高级行政长官与幕府私人代表的信,信中警告澳葡当局,如果再有传教士(或甚至是俗人)从菲律宾来日本,那么1639年抵日的澳门平底小船将被毫不怜悯地烧掉。从某种程度上说,菲律宾宗教狂热者的行为也是导致葡萄牙退出日本的因素之一。

尽管对荷兰人来说,西班牙人从未在日本市场上对其构成太大的威胁,因为马尼拉与日本的贸易时间不长,且从来就不太重要,但由于荷兰本土那时正与西班牙处于80年战争(1568~1648)

之中,海外的荷兰人也热烈地配合着,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命之一就是打击西班牙在东方的势力,并切断其收入来源^[8]。因此,与西班牙人势不两立的荷兰人总是不失时机地挑拨日西关系,新教徒英国人里查德·科克斯(Richard Cocks)和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日本名为三浦按针)也参与其中,他们不断地让日本官方意识到允许西班牙修道士继续在日本传教的危险性,声称传教士只不过是马尼拉来的武装侵略的先头部队^{[2][109]}。经荷兰与英国代理商一再的煽风点火,本来已对西班牙疑心重重的幕府将军于1624年与马尼拉断绝了外交关系,并将西班牙修道士全部驱赶出去^[9]。虽说17世纪30年代初,日本南部重新对马尼拉敞开了贸易之门,但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1633年,菲岛总督萨拉曼卡哀叹道:“我们与日本的关系破裂了,这是因为荷兰人惯用的伎俩已把以往的友谊变成了仇恨。”^{[2][113]}

综上所述,西班牙、日本之间由于相互的不信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两国的商业关系只不过是短暂的、不稳定的,而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造成的破坏也在某种程度上

加速了西日通商关系的终结。

[参考文献]

- [1] [日] 依田熹家著. 卞立强,等译. 简明日本通史 [M]. 上海: 远东出版社, 2004.
- [2]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M].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NC, 1959.
- [3]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M]. Lisbon, 1959.
- [4]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ed.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Z]. Cleveland: The Arthur H. Clark Co., 1903.
- [5] 沈仁安. 德川时代史论 [M].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 [6] [日] 井上清著.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校. 日本历史上册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4: 295.
- [7]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C].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 [8] 程绍刚译注. 荷兰人在福尔摩莎 [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0: 53.
- [9] C. G. F. Simkin. *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 [M]. London: Oxford U. P., 1968: 189.

On Trades between Japan and Spain in Modern Times

LIDE - xi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the Spanish were the Europeans that followed the Portuguese to trade in Japan. However, Japanese - Spanish trades flourished only in a brief space of time. In most of the time, the trades were bad. There were plenty of factors leading to the situation, such as the conflicts between Japan and Spain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religion, and the competitions and hindrances of other Europeans doing business in Japan.

Key words: modern times; Japanese - Spanish trades; intermittent; causes

[责任编辑:林 木]